

# 大江健三郎小说与现代文明的危机

涂 险 峰

**作者** 涂险峰, 武汉大学中文系讲师,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危机 超越 战斗的人道主义

**提 要**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从个体、群体和人类总体三个层面上对现代文明的危机进行了探索和表现, 作品中贯串着的超越、回归和战斗的人道主义三种基本精神, 成为摆脱危机的力量源泉。

捷克当代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一篇题为《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的论文中, 将欧洲小说基本精神描述为对“被遗忘的存在的探寻。”这一观点受到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一次关于欧洲人性危机的著名演讲的启发。胡塞尔批评现代文明的发展把人推入一条专门化训练的狭窄隧道, 从而看不清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 也看不清自己, 于是就陷入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所称的“存在的遗忘”。胡塞尔的演讲作于本世纪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经济恐慌泛滥, 纳粹势力崛起, 人类文明岌岌可危。胡塞尔看到, 危机的爆发并非偶然, 其潜伏期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发展的片面倾向。但是, 昆德拉正确地指出, 两位哲学家在给现代纪元下“病危通知”时忽视了自塞万提斯以来的整个欧洲小说传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全部存在主题, 都在前四个世纪的小说中“得到了揭露、展示和澄明”<sup>①</sup>。昆德拉把小说家的特殊作用提出来, 无意于否定危机的存在。恰恰相反, 小说这一主要功能虽存在却被忽视, 如同人的存在被遗忘一样, 都是危机的具体表现。人类理性的隐患长期不被察知, 直到20世纪, 前所未有的灾难降临世界, 人性危机、文明危机才成为时代的强劲主题。

20世纪文学常被称作危机的文学或“反危机”的文学。它是时代的社会历史危机与人类理性危机总爆发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灾难推向极至。二战以后, 伴随世界现代化进程, 令哲学家和作家忧虑的危险并未消失。无论是作为整体的人类, 还是作为个体的人, 其生存都面临巨大威胁。在这个同时具有进步与衰退趋势的时代, 小说家并未忘记自己的使命, 依然一如既往地对人的可能被再次遗忘或忽视的存在领域, 以及现代文明的潜在危机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创作, 正是这种探索仍在继续的重要标志。

大江健三郎是一位在创作中自始至终关注人的存在, 全力以赴表现人类文明的危机, 以及不断寻求摆脱危机, 拓展人类生存空间之道的作家。在1994年底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 他特别提到自己“把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精神’相重复的欧洲精神, 作为一个有生气的整体接受下来”<sup>②</sup>。这也是自塞万提斯、拉伯雷一直到现代欧洲作家所体现和传承的人文主义精神。大江把这种精神与东方民族的本土文化相结合,

为世界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是极富个体性而又具有全人类意义的，从“边缘”出发而切入人的存在与人类文明核心的活动。在他笔下，作家自身的痛苦体验，战后日本混乱沉重的现实，以及人类文明的潜在困境有机交织，构筑成一个生气勃勃的世界。他的十几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在个体、种族群体和人类总体三个层次上对现代人的存在状况及现代文明的危机进行了丰富而有力的表现。

## 一、个人生存危机与“日常生活的冒险”

大江健三郎早期作品在表现人的生存危机方面就已初露端倪。年轻的主人公们心中弥漫着孤独、焦虑，以及人生的徒劳、单调和无意义等感受。如短篇小说《死者的奢华》中，充满惶惑的主人公参加勤工俭学，到医学院解剖室帮助搬运尸体，但最后发现，人们费尽心力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给死者徒添一份“奢华”。作品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表现了生命的闭塞、孤独与虚无。陈尸室与外界隔绝，室中浸泡着多年来保存完好的几十具尸体，在池内载沉载浮，彼此机械磨擦，仿佛在低声“耳语”。这样的“交流”令人恐怖和震惊，如同用一种遥远的、陌生的语言诉说着“物”的世界、死亡世界的难言的孤独。貌似生命迹象的“耳语”声反衬出死亡的绝对冷漠和虚无。然而，当主人公从“物”的世界回到“人间”，却又深感苦恼。他所碰到的是他人敌意的目光，以致于深叹与活人打交道怎么这么难<sup>③</sup>。川端康成称赞这篇小说体现了作者惊人的才华。与此相似，大江早期其他作品也表现了战后成长的一代青年的普遍精神状态。在此后的《性的人》、《我们的时代》《日常生活的冒险》和《哭叫声》等长篇小说中，主人公原有的那种空虚、孤独、困惑和无所适从演变成严重的生存危机。这种危机所围绕的核心便是“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的主题，在世界文学史上并不鲜见。然而，大江所关注的则是具有充分现代意义的、带来严峻生存危机的日常性。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社会从贫困、混乱状态之中摆脱出来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人们精神生存领域却受到威胁。新的“日常性”带来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变化：在时间上，日复一日、单调重复、没有事件的“日常”使人不堪忍受，无所适从；在空间上，都市化使人口愈来愈密集却又彼此孤立、不能沟通。此外，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带来的模式化和批量化的复制增殖对个体生存造成威胁。用日本学者的话来说，“这种光会膨胀并无个性的城市模式”，使“日常生活已丧失其个性，成为千篇一律的了。”<sup>④</sup>“人们被拆散成散沙，在这种生存状态下，所有的人一开始就是孤独的。”<sup>⑤</sup>在如“恒河沙数”的人群中，在一成不变、简单重复的日子里，在无限膨胀的冷酷的平均化力量面前，人的个体存在越来越微不足道。这使大江笔下的主人公感到痛苦、焦灼和绝望。他们既不甘心接受这抹煞个体差异的日常生活，又对猛然脱离出来的激烈行为感到害怕，因而游移徘徊，充满莫名恐惧。青年主人公的苦恼，不仅是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情绪，而且是本体意义上的，对于存在失去根基的焦虑。但是，他们并不甘心沉沦于失落自我的痛苦境地，而是以各种方式去寻找人生的出路，探求生存和死亡的意义，其主要途径是以反社会的“性”和“犯罪”构成的“日常生活的冒险”<sup>⑥</sup>。于是，在大江这个时期的小说中，主人公往往逃离家庭的“囚牢”，结成小小的冒险团体，乘坐一辆轿车或快艇在都市边缘游荡，以各种偏激甚至变态方式进行冒险活动。

大江笔下人物的“性冒险”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他们虽有着粗野、直露、怪僻、频繁的性行为，但其根本目的或动因却不是性欲，而是一种广义冲动的宣泄。第二，这些行为对社会日常具有强烈的挑战性。比如《性的人》主人公有意同一个政客的妻子“通奸”，使他生出“嫉妒的角”，然后自己则像斗牛士般与这位发怒的政客嬉斗。第三，他们把性行为当作一种思想探索、哲学思考的方式。这也同样体现于那些犯罪活动之中。在个性受到威胁的时代，主人公们试图以此来体验个体存在的强度。他们往往一边行动，一边写哲学随笔，做体验卡片。较之性反常，犯罪是以更为粗暴的方式向日常性挑战，也构成更加激烈的“人生探索”。《哭叫声》中的吴鹰男曾反复自我解释他是为了“形而上”的动机而行凶的。他欲以此证明自己的个性，证明自己是与众不同的“怪物”，从而避免被无数的群体所淹没<sup>⑦</sup>。在《性的人》中，主人公主动选择做个冒险的“流氓”，并阐发了自己的“流氓哲学”。他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断地为人们制造安全感，从而将人变成

没有个性的胆小怯懦的“婴儿”。他就是要通过“流氓”行为,“把安全的婴儿室变成猛兽的丛林”。他要以自己的危险行为去创作一首“暴风骤雨般的诗”<sup>⑧</sup>。主人公们试图通过个人方式来改变日常世界,改变自己,也改变自己同世界的关系。对于这种行为,若仅从伦理道德上嗤之以鼻或痛骂狠责是简单肤浅的。大江曾表示赞成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观点:认为20世纪后半叶给文学冒险家留下的只剩下性的领域了<sup>⑨</sup>。这种看法当然值得商榷。然而,与其说它体现了作家某种程度的偏激,不如说,这样的极端表述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现代文明的危机;与其说大江作品主人公们是在以变态方式、个人方式探索摆脱危机之道,不如说这种方式本身恰恰体现了危机的严重性。正如作品结局所示,性和犯罪不仅没有使他们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个人生存危机的解脱之道,反而使之陷入歇斯底里的痛苦绝望境地。要么返回日常,随波逐流,要么走向沉沦、死亡和彻底的毁灭。当然,早期作品结局并非所有主人公人生的悲观的终点,大江对个体危机的探索和表现也没有就此止步,而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力作中,与其他层面上的危机交织在一起,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和更加宏伟的展示。

## 二、文化的“暧昧性”与种族群体危机

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大江作过一篇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演讲。与26年前川端康成那篇《我在美丽的日本》主旨不同,大江把日本文化描述成“暧昧的”文化。暧昧性在日本以多种形式呈现出来。日本在亚洲发动战争,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但自身又是这场战争和原子弹的受害者。大江主动置身于那些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渴望新生的作家之中。这些作家对日军在亚洲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反省,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sup>⑩</sup>。大江特别强调“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sup>⑪</sup>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他希望在国际上重塑日本人的形象,即“正派的”、“宽容的”、“人道主义”的日本人形象。

然而,令作家忧虑的是,日本文化的两重性、暧昧性并未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根本改变,毋宁说,战后日本经济的极其繁荣,同时“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胎芽”。许多日本人对反省战争、发展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另一方面,否定日本侵略战争史实,要求恢复并扩大日本在国际上的军事作用,甚至欲将宪法中永远放弃战争的誓言删去的叫嚣仍不绝于耳。大江等作家对此深为担忧。他认为这种策动是对二战中“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的最彻底的背叛。”<sup>⑫</sup>他说:“身为小说家,我不得不想象,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种残忍的背叛。”<sup>⑬</sup>

因此,大江的小说创作,从多方面、多角度对种族群体的潜在危机,尤其是暴力冲动进行了生动精采的表现。这一主题同样可以追溯到他的早期作品。大学时期发表的、曾获“芥川”奖的中篇小说《饲养》便是明显的例子。对待偶然流落到偏远村庄的憨厚的美国黑人土兵,村民们既亲切又残酷<sup>⑭</sup>。起初他们把他当作一个“稀奇的动物”友好对待,然而终因自身的胆怯而将黑人杀死。残忍是怯懦的另一侧面。胆怯者似乎只有将对方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才能消除心中的恐惧不安。这种心理既可以存在于某个小小的村庄,也可以潜藏在种族群体之中。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代表大江最高成就的长篇力作之一。它在表现暴力行为的群众心理和深层动机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主人公鹰四为了摆脱个人生存危机和精神上的绝望,来到祖辈居住的森林山庄,模仿曾祖叔领导的农民起义,以足球队为核心,发动了一场现代暴动——哄抢超级市场的运动。暴动使平日卑微委琐的村民们大为兴奋,如痴如狂。鹰四又通过复兴古老的亡灵祭祀——诵经舞而给暴动灌注了更大的群体激情。显然,这场暴力狂欢具有伦理上的暧昧性,它对应着大江眼中民族文化的两重性。暴动给人们带来一时非理性的民主化、自由化、平等化,但又包含着真正的破坏冲动和凌弱心理。这段情节的精采之处在于:鹰四为了将暴动维持下去,感到有必要强化这种凌弱心理。他不断人为地给暴动的人们输送想象力。他将诵经舞中祖先的亡灵形象换成弱族人的打扮,使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强敌,即被哄抢的超级市场的主人,只不过是“贱民”。当他们嘲弄这些“亡灵”时,就获得了蔑视对手的力量。“一旦他们把敌人蔑视成可以

恣意践踏的弱者，他们就能够做出最为无耻的事情。”尤其是他们唤起了战前和战争中优越感的“甜美记忆”，感到自己是“强者”而心旷神怡<sup>⑥</sup>。种族凌弱意识强化了这场暴力狂欢的亲 and 凝聚作用，使人们变得更加疯狂，而将暴乱推向新的高潮。

大江在小说中批判了这种通过侵袭弱族来掩盖自己的恐惧和怯懦的卑劣的民族意识。在一定意义上，种族凌弱意识和暴力狂欢的群众心理也具有某种普遍性。凌弱意识、暴力狂欢的非理性冲动与极端民族主义的结合，既会给其他民族，也会给本民族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危险和灾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的敏感的作家，大江从未停止以自己的笔对人类群体的危险冲动予以表现，并且站在超越狭隘民族主义感情的人道主义立场上进行积极的、毫不妥协的抗争。

### 三、核战争阴云与人类总体危机

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大江说：“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体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sup>⑦</sup>大江本人的生活遭遇是连接的枢纽。长子天生大脑残疾，使大江精神上受到强烈震动，于是便有了那部描写残疾儿带来的痛苦感受和表现人的超越精神的名作《个人的体验》。在对残疾主题思考的同时，他将注意力投向广岛、长崎那些在原子弹后遗症的惨酷病痛之中挣扎的不幸的幸存者。随后，写下了访谈随笔《广岛札记》。这对他终生创作影响深远。他不仅真切感受到原子弹受害者的惊心动魄、骇人听闻却又不被理解的痛苦，而且更深刻地体会到现代社会里核武器的存在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威胁。这一主题与大江所关心的诸种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一幅现代人类危机图。

长篇小说《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是展示核威胁造成的社会政治动荡以及人们的心理恐慌的典型作品。政治经济集团的纷争由于核武器的存在或可能存在而剧烈升级，因而变成人类性质的危机。核武器能造成新的权力结构。掌握核武器的人，可以全体人民为人质，摧垮民主政治，获得天皇般的极权地位。小说中的大资本家便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巨款赞助民间集团秘密制造原子弹，进行大规模的恐吓活动。在这部略带超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风格的作品中，主人公父子二人自称受到“宇宙精神”的指派，发现人类即将被核武器毁灭的危险，经过神秘的肉体“转换再生”，挫败了核讹诈阴谋，挽救了人类。然而，小说中这些故事全都出自一个因不断向人类揭示核威胁而被当作疯子的人的叙述。这位人类末日的宣告者，是个似疯实醒的“先知”式人物。真正的危机不受重视，预言被当作痴人狂想，人类的危机因此显得愈发严重，愈加令人不安。

核危机与反核是大江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或直接表现，或间接涉及。作品对于人类近乎末世预言般的描写并非故意耸人听闻。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至今仍在增长。《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中所描绘的巨大危险依然存在。从根本上讲，核武器造成的危险趋势潜藏在人性之中。对此，大江在写《广岛札记》和《生的定义》时早已预见。他认为广岛的悲剧并未使人类充分意识到核武器的严重后果。在人们心目中，核武器主要是作为一种威力、一种民族自豪感的象征，而非带来灾难和毁灭的凶神。大江还非常敏感地注意到并颇为忧伤地指出，整个人类都在努力忘掉广岛。广岛的受难者对自己的不幸不堪回首、不愿面对，那种情景可以理解。而原子弹的肇事者更是试图将这最为悲惨的一幕从人类记忆中抹去。此外，正在壮大核力量的国家都在潜意识中排斥对广岛的回忆。所以“地球上人类的任何一个人都在力图彻底忘掉广岛，忘掉发生在广岛的最为严酷的人类悲剧”<sup>⑧</sup>。在这核武器当量已达到足以毁灭一切的世界里，种族冲突、政治较量形成的战争潜能及其灾难性后果都被无限扩大。世界像个巨大的火药库，任何一点火星就能引爆它而彻底毁灭人类。数千年文明发展进步至今，人类才意识到它的最大敌人，不是鬼神，不是自然，而是人类自身。大江通过作品提出了刻不容缓的严峻问题：面对现代文明的严重危机，作家何为？人类何为？

### 四、超越、回归与“战斗的人道主义”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创作，不仅从多方面展示了现代文明的危机，而且也在努力发掘人类自身中蕴藏的拯

救危机的力量。他的作品回荡着三种基本精神,被当作战胜危机的力量源泉。

其一,是对个人生存困境的超越精神。如前文所述,大江早期作品主人公们面对个人生存困境,试图以“性”和“犯罪”去探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缓解心中的痛苦。他们的行为以某种戏剧性方式强化地表现了危机,却对战胜危机毫无作用。他们不愿自欺欺人地在日常生活中随波逐流,但自暴自弃,颓废放纵却是另一种自欺,只能表明他们逃避责任,不敢直面生存困境的怯懦胆气。懦弱和颓废是作者从自己身上发现的,需要不断“驱除”的“恶魔”。摆脱严峻的生存危机,必须怀着面对本体上的孤独的莫大勇气和顽强的超越精神。它们来自大江与残疾儿相处的个人体验,也有广岛的启示。广岛受难者忍受着肉体上的非人折磨和心灵上的极度孤独,不被人理解,没有希望没有未来而默默承受一切,表现出令人敬佩的胆气和不肯屈服于绝境的“人的威严”。大江写道:“他们直接给了我勇气;反过来,我也品尝到了因儿子置身于玻璃箱中深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种子和颓废之根,被从深处剝出来的痛楚。而且,我开始希望以广岛和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来检验我内心的硬度。”<sup>⑧</sup>《广岛札记》和《个人的体验》都从正面表现了面对不可避免的灾祸(或原子病或天生残疾)的打击,强忍心灵痛苦的孤独的超越精神。《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主人公鹰四短暂的一生也是顽强超越“心灵地狱”的一生。他少年时代曾在闭塞苦闷之中一时冲动与白痴妹妹犯下乱伦之罪,这成了他一生的精神负担。为了克服内在的罪的煎熬和外在的耻的折磨,他投入一系列狂暴的激烈活动之中,既扮演罪犯也扮演英雄,最后战胜内心的怯弱,抛弃各种掩饰的面具和自欺的行为,克服“他人”的精神奴役带来的恐惧,实现了最终的超越。这种超越精神又鼓舞了作品中其他人物去勇敢承担人生的痛苦与责任,在微茫的希望中为人的尊严而战斗。

其二是回归与寻根精神。回归也是大江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它既包括对自然、森林的回归,也包含着对传统和历史的认同,两者往往水乳交融。森林是大江自小迷恋的地方,也是他小说中主人公摆脱危机、寻求精神再生的场所。如叶渭渠先生所说:“森林和山谷村落,始终都是作为日本的心象风景而在作家的感觉世界中展现。”<sup>⑨</sup>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鹰四和蜜三郎夫妇便是从森林峡谷山庄,从一百年前的历史传说中寻找认同的依据和新生活的源泉。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中,大江驰骋想象,在“村庄=国家=小宇宙”这个独特的虚构世界里,对人类文明的总体性进行了广阔宏伟的表现。向森林、自然和交织着神话传说的历史传统回归是大江小说的一贯主题。其他作品如《饲育》、《感化院的少年》、《核时代的森林隐者》、《熊熊燃烧的绿树》等皆不例外。日本民族“泛神论的自然观和日式‘部落’的传统观念”<sup>⑩</sup>对大江影响颇深。他正是在日本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的。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科学技术将自然当作征服、改造、利用、榨取的对象,导致现代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崩溃。核危机、生存危机甚至个性危机也是其畸形发展的结果。从犹太一神教沿袭下来的基督教传统亦包含着对自然的蔑视。现代世界文明的危机主要来自西方文明的片面发展。大江小说中回归森林与认同历史,是对畸形文明的矫正,是人与自然、与传统恢复亲和关系的象征。

第三种基本精神是“战斗的人道主义”。本文开头曾提到,大江整体接受了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精神”相重复的欧洲精神。然而,昆德拉的小说精神主要指对于存在的整体把握,强调的是包含着怀疑性、模糊性的相对精神。但是,大江小说所体现出的鲜明态度已越出昆德拉对小说精神的界定。在这一点上,大江更多地受到萨特等人介入现实、干预生活以及为观念而战的精神的感染。从他获奖词中引用的名言“不抗议(战争)的人,则是同谋者”可以见出这种毫不含糊的战斗姿态。在随笔《生的定义》中,大江指出战斗的人道主义属于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虽对人类危机颇为悲观却勇敢前进的人<sup>⑪</sup>。这种人道主义是坚韧的,但不是冷漠和迟钝的。恰恰相反,它体现了对冷漠的憎恶和对“亲切”的呼唤。人道主义的敌人是那些“远庖厨”却“爱荤腥”的“君子”对被屠宰的生灵的隔膜。他引用了日本作家武田泰淳的作品《无感觉的按钮》来表明以按钮发动核战争者的冷漠。此外,还有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对整个人类的危机或无意或有意的遗忘。所以大江在创作中时刻召唤广岛人、残疾儿和心灵破残者的具体的感性形象,表现他们的非人的痛苦,以克服冷漠、麻木,消除理解交流的障碍,并通过与森林、自然、受难者和残缺心灵共栖共生而唤起人类的“亲切”感。大江的人道主义虽是昂然进取的,但并非盲目乐观的。相反,那是在悲观之中勇敢前进的,在孤

独之中奋然超越的精神。他在托马斯·曼和鲁迅身上都发现并印证了这种悲观的战斗的人道主义。他认为鲁迅就是“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如鲁迅先生所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sup>⑥</sup>

这也是大江文学创作的显著特征，即不断地从微茫、脆弱与蒙昧晦暗之中吸取力量。他的希望是雪莱诗中所说的“太似绝望”的希望。他在残疾儿、广岛原子病患者身上，从沉默无言的森林中寻找精神源泉。小说里虚构的情节也象征性地体现出这个特点。《同时代的游戏》里，孕育着再生希望的是已死的森林巨人的变成干蘑菇般大小的躯体。在《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中，“宇宙精神”派来拯救地球核危机的使者由白痴儿经过神奇的肉体转换而成。对人类危机、种族危机的拯救也好，对个人危机的超越也罢，在大江的小说中，希望是微茫的，超越的根基也是脆弱的。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曾批评《个人的体验》主人公获得新生的转变过于突兀，这种克服人生悖论的依据是三岛苦苦探索不得解脱的<sup>⑦</sup>。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主人公的转变也具有跳跃性，同样得不到逻辑的充分证明。然而笔者认为，大江表现人在危机之中缺乏根基、近乎荒谬的转变和超越是别具意义的，正如西西弗斯徒劳却顽强地推石上山的价值一样。石头推上山后仍会落下。大江创作中那种与人类危机及自身软弱颓废倾向的斗争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与微茫和脆弱共生，在悲观之中奋然前进，需要的是更强韧的心灵力量。这种力量既来自于他的“个人的体验”，也来自他为使民族乃至全人类摆脱危机和困境而作出的巨大努力。不断的努力维系着大江创作上的进取。正如他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中所说：“如果可能，将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 20 世纪，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们的苦难。我还在考虑，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展望世界，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sup>⑧</sup>这是大江健三郎对自己一生文学事业的总结，也是他在面临现代文明的危机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对“作家何为”、“人类何为”问题的有力回答。

#### 注 释：

- ①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 3 页。参看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年版。
- ②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见《大江健三郎作品集》附录，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5 年版。
- ③ 大江健三郎：《死者的奢华》，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5年版，第 37页。
- ④ ⑤ ⑥ ⑨ ⑰ ⑱ 松原新一等：《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版，第 521 526 540 - 542 538 355 355页。
- ⑦ 大江健三郎：《哭号声》，见《青年的污名》，作家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80页。
- ⑧ 大江健三郎：《性的人》，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5年版，第 57页。
- ⑬ 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59页。
- ⑰ ⑱ 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5年版，第 78 4页。
- ⑲ 叶渭渠：《大江健三郎文学的独特魅力》，《大江健三郎最新作品集》代序，作家出版社 1996年版。
- ⑳ ㉑ ㉒ 大江健三郎：《生的定义》，见《广岛札记》，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5年版，第 300 234 311- 312页。
- ㉓ 王中忱：《边缘意识与小说方法》，《大江健三郎作品集》译序，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5年版。

(责任编辑 谭辉霞)